

上個月一天晚上接到金聖華教授從香港打來的電話，她一開言我便感到不祥，平常接到她的電話總是笑聲溢耳，一片喜悅的，那晚她聲音低沉，緩緩告訴我高克毅（喬志高）先生走了。金聖華最關心高先生，常常打電話去問候他，所以我也多是從她那裡得知高先生的近況。今年一月間，我自己曾打過一次電話給高先生，因為記掛他的健康，知道他這一陣身體狀況不太好，電話沒有人接，只好留言問安。過了幾天，也沒有回音，這有點不平常。從前我給高先生電話留言，他馬上就會打回來，而且很高興，一講就是一二十分鐘。我懷疑高先生是不是進了醫院，後來金聖華告訴我果然高先生住院了。可是2月上旬我卻接到高先生一封來信，是一張卡片，羅德島的海岸風景：冬日暮色，夕陽西下，寫信的時間竟是“戊子除夕”，先告了平安，然後是他幾句一貫勉勵的話。高先生的信總是那樣親切，他說身體行動已不便。那封信很可能是除夕夜在病床上寫的，字跡有些不穩了。前一兩年，高先生還常在《明報》月刊上寫稿，90多歲的高齡，思路清晰不減當年。我接到他的信，本來松了一口氣，他能寫信，精神大概還是不錯的，沒料到那竟是他給我最後的一封信，是他寫下的遺言。

我與高克毅先生因翻譯而結緣，亦師亦友達30餘年。1976年美國印第安納大學預備出版一系列英譯中國文學作品，《台北人》入選，我們組織了一個翻譯小組，由我與加大的同事葉佩霞（Patia Yasin）執筆翻譯初稿，而我們很幸運請到了高先生做《台北人》英譯的編輯，替我們加工潤色。高先生在香港創辦《譯叢》（Renditions）時，曾刊登過《台北人》中兩篇小說《永遠的尹雪豔》及《歲除》，這兩篇譯稿也經過他精心修改，所以他出任《台北人》英譯編輯也就順理成章了。可是沒有想到，《台北人》英譯前後竟花了近5年的工夫，變成了一項耗時費力的浩大工程。高先生為了編輯這本書，投入驚人的心血與精力，令人十分感佩，也就在那5年與高先生共同工作的期間，才深深體認到高先生中英兩種語言學養之廣博豐厚以及他待人處世寬容和藹的長者之風。

譯筆精確流暢

堪作翻譯範本

1976年高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學客座三年後返美，路經洛杉磯便到聖芭芭拉來，那是我們翻譯小組第一次會面。在見高先生前，我與葉佩霞未免有點忐忑不安，因為高克毅先生的名氣大，是翻譯界的第一把高手，讀讀他那幾本《美語新詮》系列以及他編的《最新通俗美語詞典》，就知道他的英語尤其是美式英語之精通嫻熟是多麼令人吃驚了。而他英譯中的那幾部美國文學名著：費滋傑羅的《大亨小傳》、伍爾夫的《天使，望故鄉》以及奧尼爾的《長夜漫漫路迢迢》，譯筆之精

確流暢，每部都可以用作翻譯課上的範本。

高克毅先生是少數能悠遊于中英兩種文字之間，左右逢源的作者、翻譯家。我們請來這樣一位名家來當我們的編輯，當然有點害怕動輒得咎，難以施展。未料到跟高先生一見面，我們的疑慮馬上煙消雲散了。原來高先生一點架子也沒有，是個極可親的學者長輩。他的世面見得多，青少年時在上海北平求過學，又在紐約、華盛頓、舊金山長期工作過，中國美國大概各種場面都經歷過了，見多識廣。聽他聊天，各種典故出口成章，簡直是一本百科全書。高先生談話風趣，富幽默感，那次跟他相聚，我跟葉佩霞感到如沐春風，其樂融融，我們三個人很快便形成了一種團隊精神，憑著這股精神，我們展開了長達5年的《台北人》英譯工程。

彬彬君子中國修養

典型紳士西方風度

高先生住在東岸馬里蘭州華盛頓附近，我們工作只得靠書信電話往來。那時候還不興用電腦，連傳真機都是罕有之物，我和葉佩霞把一篇小說的初稿譯出來用打字機打好字，然後寄給高先生。高先生使用鉛筆一字一句仔細修改，再寄回來。我們把修訂稿重打一次，又寄給高先生，讓高先生最後再潤色一次才算定稿。就這樣一來一往，14篇小說的修訂稿足足裝了一大紙箱，我把這些譯稿都捐給加州大學聖芭芭拉校區的圖書館去了。日後有人有興趣研究《台北人》的英譯，高先生的修訂稿是最好的材料。從他這些修訂，看得出他曾下過多大工夫，費盡多少心血，往往一字一句地更改便收畫龍點睛之效，英文運用之妙，令人嘆服。當然我與葉佩霞在翻譯初稿上也費了很大心思，但我們翻譯原則求信為先，不取巧，儘量把原著忠實譯出來，還顧不上達與雅，只是一個粗坯，要經過高先生的精雕細琢才能成器。譯書完成後高先生卻一點也不肯居功，對於他在這次翻譯《台北人》所占的比重，輕描淡寫，略而不提。我知道他宅心仁厚，不想搶葉佩霞跟我兩個譯者的風光，這就是高先生體貼晚輩的長者之風。高先生的知友宋淇先生曾替高先生的散文集《鼠咀集》作序，其中有一段話寫高先生我覺得講得最恰當，我願再引用一次：

說起來奇怪，喬志高自己也許不知道，他本身就集中國人的德性于一身。同他接近的人都有一種如沐春風的感覺，這來自他的和藹性格，令人想起《論語》第一章的：“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

的確，高先生既有中國人彬彬君子的修養，又有西方人典型紳士的風度，是集中西文化的美德于一身的人。跟高先生一起工作5年，真是合作愉快，受益良多。

《台北人》英譯本于 1982 年出版，當然我們這個翻譯小組也就自動解散了，可是我和高先生兩人卻一直有書信電話聯繫，我們對那幾年翻譯小組的團隊精神都很懷念珍惜。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十幾年後卻把幾本中國文學英譯系列停止印行了，《台北人》也在其中，於是這本譯著一下子賦閑了好幾年，有幾所美國大學要用來做教材，只好影印。高先生和我都覺得我們花了這麼多心血在這本譯著上，任其斷版實在可惜，須得另外找一家出版社來延續其生命。後來高先生終於聯繫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而且預備出中英對照版。高先生和我都非常興奮，於是把葉佩霞又找了回來，我們三人把《台北人》英譯從頭再訂正一次才付梓。

2000 年中大出版社的《台北人》中英文對照本出版了，印得很漂亮，高先生頗為滿意，他對這本書是很有感情的。恰巧那一年高先生和我應中文大學金聖華教授之邀，擔任她主辦的“新紀元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的評審，高先生擔任翻譯組，我是小說組，我們一同到香港去參加頒獎典禮。中大出版社趁機在中央圖書館安排了一場我與高先生兩人並列的演講，就講《台北人》翻譯的來龍去脈。那天來了不少聽眾，發言踴躍。我有多年沒見到高先生，竟有機會跟他同台演講我們合作的經過，當然分外高興。那次高先生赴港，梅卿夫人同往。梅卿夫人畢業于衛斯理學院，舉止間自有一份高貴嫺雅。高先生那年已有 89 歲，可是神采奕奕，一點也不顯年紀。他跟梅卿夫人走在一起，真是一對令人羨慕的神仙伴侶。

樂觀豁達擁抱生命

暮年喪偶打擊沉重

那一次在香港的歡聚，沒料到竟是跟高先生最後的一次聚會。接下來數年間我忙於推廣昆曲《青春版〈牡丹亭〉》的演出，多半時間奔跑于兩岸三地，回美國的時間少，對高先生也就比較疏于問候了。前兩年知道梅卿夫人逝世，我打電話給高先生。他說梅卿夫人不在了，他生活很不習慣，深沉的悲痛在話語間。高先生一向樂觀豁達，90 多歲的高齡，照樣經常寫文章、編字典，熱烈擁抱生命，不肯屈服于時間的壓迫，可是暮年喪偶的沉重打擊，到底不是像那樣年紀的人容易承受的。梅卿夫人辭世後，高先生的身體健康開始急速走下坡，雖然他一直勇敢地撐著，除夕夜病床上還給我寫信，可是最後終於不支倒下。

他給我那封信末尾有一行英文：

Year of the Rat (my year! Born 1912)

高先生生辰屬鼠，今年是他的本命年，享齡九十六。

2008年4月12日